

***Living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By LAURA M. AHEARN.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1. 368pp.**

《活語言》一書是對語言的社會學研究在人類學領域之發展的入門介紹。關於語言的研究是哲學領域中艱深的一環，而人類學的理论建設與哲學的發展聯繫緊密。人類學家在進入研究對象所在團體進行參與式觀察時，能了解與熟練運用對象語言是必備的素質——即便學者與研究對象群體運用同一語言，也因其所處社會環境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用語習慣，熟悉對象團體的用語習慣比學會其語言的語法和發音更為重要——所以當人類學家開始詮釋自己的觀察結果時，或多或少會涉及語言人類學的研究方法與結論。筆者認為，像此類對初涉人類學的學生作關於語言人類學的綜合介紹的書籍是很重要的。

書的第一部份是對語言的理解。作者列舉了語言的五個基本組成部份：一、音韻學(phonology)：發音；二、形態學(morphology)：詞語的內在結構；三、句法(syntax)：句子結構；四、語義學(semantics)：關於詞語與句子含義的分析；五、語用學(pragmatics)：在實際社會環境中生成的意義。

語言人類學最為關注的是語用學。作者引用前蘇聯學者米哈伊爾·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的解讀，即「語言自有其社會生命(“a socially charged life”)」(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M. Holquist (e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93 )。語言人類學家自覺地把自己的工作與傳統語言學家的工作區分開來，他們更加關注的是語言作為思考的模式和文化實踐，預設並引起人生存環境的變化。即他們關注言語使用的社會環境和言語自身的功效超過對語法結構及語言所傳遞的資訊的關注。通過與相關學科的比對得出本學科關注點並由此深入是必要的。語言現象是一個整體，關於語用學的研究需要配合圍繞上述幾個組成部份的多種研究方式，但同時也需要明晰研究的中心問題。

因法國社會學家愛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的影響，人類學的討論往往在「社會」的層面上進行。為語言人類學發展奠定基礎的俄羅斯學者羅曼·雅各森(Roman Jakobson, 1896-1982)所提出的語言功能模型即為一個交流模型(有說話者和接收者。獨白語言亦受社會環境限定，與獨白者自身形成對話，見上頁注巴赫金著作)。從書中頁18的模型可看出傳統語言學家的研究範圍大致局限在功能3，即在言語所傳遞的具體資訊。如

若要關注語言的社會功能，或說語言如何塑造了人類社會又被其塑造，那麼模型中六個功能都需充分的探討，這便是語言人類學家的關注點。由此出發，作者總結出了四個語言人類學關鍵詞，涵蓋了她本人對語言人類學的理解：

1、語言的多種功能(Multifunctionality)：基本沿襲了雅各森的理解，然而引用芝加哥大學語言人類學教授 Michael Silverstein 對「元語用學」(Metapragmatic，即指向語言使用方式的語言)的解讀增加對功能6「代碼(Code)」的闡述(“Metapragmatic Discourse and Metapragmatic Function”, in J. Lucy, (ed.), *Reflexive Language: Reported Speech and Metapragma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58)。

2、語言的思想體系(Language Ideologies)：可以概括為對語言的態度和感覺。作者在隨後的闡述中第一次提及語言人類學內一個重要而廣受爭議的研究框架，即關於語言的思想體系的研究對象是一個特定的社會或文化群體。由此，作者提出語言的思想體系在特定群體中亦是多樣化的，受群體成員不同程度的認知，及受社會結構和言說方式的影響。

3、語言的實踐(Practice)：其基礎思想是語言和社會結構同時限制與引起人類的一些行為，而這些行為將建立、重建與重新配置同類結構，如此不斷演進。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曾用他的「社會習性(Habitus)」理論對此直接進行闡釋(*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作者同時提及了許多學術領域引用的「發生」(emergence，源自生物學術語)理論說明語言在語法和社會習俗限制下仍有強大的即興展演特性。

4、語言的指向性(Indexicality)：這一領域是語言人類學自雅各森時代以來的最重要發展，深受查里斯·皮爾斯(Charles S. Peirce, 1839-1914)的符號學(Peirce's Semiotics)理論影響。近年來最重要的語言人類學家們都從皮爾斯的基礎理論出發探討語言形態「指向(point to)」社會與文化語境的巨大潛能(W. F. Hanks, “Indexicality,”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9: 1-2 (1999): 124-126)。而理解語言指向性的前提是理解使得言語及言語行為發生意義的特定的社會情境。

作者在隨後介紹研究方法時指出，人類學家作參與式觀察時應儘量順應研究對象的用語習慣。單純學習對象群體的語言語法和進行分類與分析式研究並不能勝任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懂得說話和聆聽的時機，觀察群體成員在自然語境下相互回應的用語習慣，並輔以觀察他們在敘說歷史故事，談論

地名人名與進行書面文學創作的用語習慣等等。最佳的研究方式是綜合使用多種定量及定性研究方法。作者隨後單列一章綜述言語習得與社會化研究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ocialization)，通過列舉嬰兒和青少年如何通過周圍言語環境習得自身社會定位和言語習慣的研究案例，作者充分展示了語言人類學家進行參與式觀察的研究方法。

最後，作者進入了語言人類學最難也是最重要的部份：探討語言與思想之間的關係。對語言相對性 (Language Relativity) 一個半世紀的探索展現了這一研究的歷程，德國語言學家威廉·馮·洪堡 (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在19世紀初期的語言結構分類研究可視為這一歷程的起點。美國人類學之父弗蘭茲·博厄斯 (Franz Boas, 1858-1942) 和他的晚輩學者愛德華·薩丕爾 (Edward Sapir, 1884-1939)、本雅明·沃夫 (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 使關於語言結構分類與人類思想結構的分異之關係的探討在人類學領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近一個世紀裡，人類學家們關於語言相對性的探討從未失色，而其漸漸與三個重要的近代人類學命題產生聯繫：一、權力的自然屬性；二、社會機構的自然屬性；三、普遍性與多樣性的對立。

書的第二部份着重討論了上面提到的關於語言人類學研究對象群體的界定。歷史上人類社會的多種發展使得這種界定面臨多重的不確定性：地理上的封閉走向資訊流通，書面語的興衰，國家概念的形、成、演、化與邊界的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形、成與標準語的作用，網路發展與全球化，地方文化群體自身的觀念形、成等等，都使得人類學對界定研究對象群體的標準不斷進行改變。作者同時提到了人類學自身研究理念的發展產生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例子是表演人類學 (Performance Anthropology) 理論的興起。這一理論的研究者強調口頭語言的即興展演特性和進行口頭語言展演的文化語境的變化 (R. Bauman,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77: 2 (1975): 290-311; Victor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2)。

書的最後一部份集中討論了近年社會學研究的熱點問題與語言人類學的關係，其中涉及性別問題、種族和暴力等等，這些皆可歸結為社會學上長期的對權力和社會機構的探討。作者列舉了三種與語言在實際社會情境下的運用最為關聯的社會學研究：

- 1、建立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安東尼奧·葛蘭西 (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工作之上的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 關於文化霸權 (Hegemony) 的研究：其強調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定社會情境下經濟和

政治原因產生的社會不公與社會統治系統機制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

2、蜜雪兒·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關於權力關係和語段(power relations and discourse)的研究：權力關係是隱藏在一系列對可能發生的行為的鼓勵或壓制之中的，其中提出特定語段使其成為知識與話題是權力構建的重要方式 (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P. Rabinow and N. Rose, (eds.), *The Essential Foucault: Selections from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3, 229-245 ) 。

3、以皮埃爾·布迪厄為主的社會學家關於實踐理論 ( Practice Theorists ) 的研究：言語的思想體系直接喻示了交換言語者之間地位的差異和權力的設置，而言語使用者很少直接意識到這種現象。

語言人類學教科書與文獻常見的寫作方式是先回顧研究問題的學術史，作相關哲學問題和社會學思潮的綜述和討論，然後舉出研究實例。成熟的學者能將通讀理論之後的心得化為田野工作的想像力及解讀觀察結果的敘事風格。然而大部份學生在尚未完全讀懂艱深的理論時，難以建立理論與例子之間的關係，也很難通過例子更好地理解理論。所以，許多學生在自己的寫作中也常常出現理論綜述後加以民族誌式敘事，兩者間關係不明朗的局面。阿海恩這本著作能對學生作出很好的引導。她採用了從實例出發的方式：作者先敘述自身觀察或文獻中的觀察實例，引導學生關注例子中的語言現象，再引用相關研究方法對其加以分析。而且作者選取的研究實例廣泛而具代表性，在介紹理論艱深的研究案例時，用大篇幅，以深入淺出的語言作詳盡闡釋，說明學生學習運用理論進行分析的過程。雖是入門級教科書，作者並沒有犧牲學術討論的深度，語言人類學領域最困難及最具爭議性的語言相對性，最技術型的語法分析，較新的書面語言分析等等，在此書中都有前沿的討論。

彭李菁

愛爾蘭國立梅努斯大學人類學系